



梁?超的“革命”?

著者	朱 琳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5
page range	115-129
year	2012-02-0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Liang Qichao 's Thoughts on “ Revolution ”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6120

梁启超的“革命”论

朱 琳

Liang Qichao's Thoughts on “Revolution”

ZHU Lin

This essay focuses on Liang Qichao (1873-1929), an important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explores his discussion and views of “revolution”. There are many who point to Kang and Liang as being the “reformation school”, b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Liang Qichao experienced internal conflict over “reform” and “revolution”, and faced a watershed in his thinking. I have therefore turned to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as a suggestion or hint to analyse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background that led to the changes in Liang’s theory of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his ideology in an attempt to portray Liang’s “change” and his “stability”.

After providing a basic background for Liang’s activities, I focus on an historical setting for 1902, and open with a discussion of Liang’s political novel *Xinzhongguo weilaiji*, in which I consider the psychological conflict of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this work. I trace the changes in his ideology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Liang’s choice of terms for translation of “revolution” – *geming* [Jp. *kakumei*] –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hoice. I end with an analysis of his record of a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03 as part of my search to identify the catalyst that led to the change in his ideology.

Given that the Xinhai Revolution occurred one hundred years ago, I believe there is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turning once more to the era in which the term *geming*, or “revolution”, first appeared.

キーワード：梁啓超；「改良」；「革命／変革」；1903年のアメリカ遊歴

前 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内忧外患，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通过各种方式摸索着救国之路。对于这段过程，后年，梁启超（1873-1929）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一文中将“西洋的冲击”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感到“器物”上的不足而兴起洋务运动的时期、感到“制度”上的不足而兴起维新运动的时期、感到“文化”上的根本性不足而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时期。¹⁾ 梁启超本身就是

1)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4月（《申报五十年》1923年2月所收。《饮冰室文集点校》5，3249-3250页）。以下，梁启超的文章的原文引用主要依据《饮冰室文集点校》全六集（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未收录其中的，则参照《梁启超全集》全十卷（梁启超著，张品兴等编，北京出版社，1999

维新运动时期“改良派”的核心人物，与师傅康有为（1858-1927）一起被世人以“康梁”并称。

1898年，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不得不开始了流亡日本的生活。在日期间，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吸取明治日本以及经由日本传来的西方的新知识，“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²⁾。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以“衰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爱国者”、“中国之新民”、“饮冰室主人”等笔名进行着活跃的言论活动，并以其绚烂华美且极具煽动性的美文感动了一代中国青年，其中包括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毛泽东（1893-1976）、郭沫若（1892-1978）等。后来，他在回忆自己这段思想较为激进的时期时，虽略带反省之意，但是还是将自己勇于打破闭塞现状的角色定位为“新思想界之陈涉”。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缩，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³⁾

在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表现出纠结的一面，并曾一度倾向“革命”，迎来了其思想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往的研究虽然对此有所涉及，但是没有较为系统的分析与阐释，为此，笔者在本稿中试图以“革命”这一概念为线索，对梁启超的“革命”论的变迁以及促成其思想前后发生转变的内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描绘出这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变”与“不变”。

一 “改良”抑或“革命”——《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心理纠结

梁启超曾经写过〈善变之豪杰〉（1899年）一文，作为连载于《清议报》上的《自由书》的一篇。文中，他选取了从公武合体论转向尊王讨幕论的日本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59），以及由于秘密结社而入狱、后来成为王国的首相、完成意大利统一大业的政治家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 1810-61），认为“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⁴⁾ 梁启超这样叙述说：

《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⁵⁾

年)。

2) 〈夏威夷游记〉记录了1899年12月17日—1900年1月10日的事情，旧题为《汗漫录》或者《半九十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1824页。

3)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3101页。

4) 〈自由书·善变之豪杰〉《清议报》30，1899年10月25日（《饮冰室文集点校》4，2267页）。

5) 同上，2267页。

又在〈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一文中，梁启超对比地选取了始终贯彻统一德国之主义的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98），以及并不坚持某一主义、不拘囿于某一政见的格兰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98），认为变与不变并不是问题所在，如果有“至诚”的话，哪一方都非常出色。梁启超认为：

然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夫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亦月异而岁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日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故能如格兰斯顿者，可谓之真维新，亦可谓之真守旧矣。俾公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屡变其主义，而非首鼠两端者所可学步：曰惟至诚之故。⁶⁾

这两篇看上去就像是梁启超为自己后来摇摆不定的言行进行自我辩护而事先准备好的言辞。师傅康有为曾将其思想上的变化归结于性格上的“流质易变”⁷⁾，但是，在梁启超自身看来，那毋宁说是在认清时代状况的基础上，“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⁸⁾，是一种思想上的前进。

1902年这一年，在考察梁启超的思想之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新民丛报》（前一年停刊的《清议报》的后继报纸）和《新小说》相继创刊，登载在前者上的〈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登载在后者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文章。

而且，不仅如此，在亡命日本之后，与“革命”论急速接近、倡导“自由”、“共和”、“破坏”的梁启超，在这一年里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章，与师傅康有为之间的立场以及意见的齟齬表面化，迎来了思想上最为激进的时期。

另一方面，梁启超倡导“破坏”的这一时期，也是革命派形成和革命论兴盛的时期。翌年1903年对于清末的革命运动而言是有着划时代意义、极具象征性的一年。以这一年为界，此前未分化而采取共同行动的革新势力截然分为两派，即志向在清朝体制下进行改革的“改良派”与致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高声鼓吹打倒满族王朝的“革命派”，而且，这两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激化。其标志是邹容（1885-1905）的《革命

6) 〈自由书·俾士麦与格兰斯顿〉《清议报》25，1899年8月26日（《饮冰室文集点校》4，2252页）。

7) 康有为〈与任弟书〉1902年12月13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151页）。

8)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3100页。在追忆梁启超的文章中，关于他的“善变”，有以下叙述。“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88页。）而且，梁启超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如此说道。“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夺权力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18页。）

军)、陈天华(1875-1905)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一系列重要革命文件的出版。⁹⁾乘此之势,1905年,革命诸团体或合流或联合,孙文(1866-1925)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并创刊了机关报《民报》。

梁启超以明治日本为媒介了解了很多西洋思想,在直面中国的现状时,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略,他在改变现状的手段、政体、国家模式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深深的迷惘。其中,表现了梁启超种种逡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所致力于创作的未来记型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¹⁰⁾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中略)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之不衰,(中略)《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就像在“绪言”里叙述的那样,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开始构想中国未来的形象,在发表这篇小说时,他甚至为此专门发行了杂志《新小说》,足见他的意气风发。¹¹⁾这部作品虽然是杜撰的内容,但是“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并不终结于杜撰。¹²⁾那不仅是梁启超自身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初次实验——“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也可以看作是包括他自己在内,虽然对于混沌中国的未来抱有不安和困惑但还是试图寻求变革的很多中国人思想纠结的记录。¹³⁾

9) 这四种文献中,除了陈天华的《警世钟》(1904年)之外,其他三种都是1903年出版的。

10) 《新中国未来记》由五回构成,是未完之作。第一回和第二回登载在1902年11月发行的《新小说》创刊号上,第三回与第四回分别登载在第二号(同年12月)、第三号(1903年1月)上。到第四回为止都连载得很顺利,而第五回则登载在半年以后的第七号(1903年8月)上。关于第五回不是梁启超之作一说,余立新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不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古籍研究》1997年第2号)中,举出五大证据详细地进行了论证。而且,据山田敬三推测,这第五回是由罗孝高(1876-1949)创作的可能性很大(山田敬三『『新中国未来記』をめぐって——梁啓超における革命と変革の論理』狭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另外,梁启超从很早时期就开始关注于在日本的政治小说的社会性作用。“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中略)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中略)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文集点校》4, 2276页。)

11) 《新中国未来记》《新民丛报》1-3, 1902年11月-1903年1月(《梁启超全集》10, 5609页)。

12) 同上, 5609页。作品中的登场人物当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但是,显然梁启超在登场人物的取名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分别融入了特别的含义。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结束逃亡生活回国之际,在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未来》(也题为《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作为同年12月1日《庸言报》第1号的《代发刊词》中,回顾了自《时务报》以来的言论生活。其中,对于这篇小说,他回忆道:“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中华民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岂不异哉。”(《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未来》《梁启超全集》4, 2509页。)也就是说,“罗在田”这一名字中,“罗”是光绪帝的姓——爱新觉罗,“在田”是用同音汉字置换了其载湉之名。“黄克强”里则蕴含着黄帝的子孙努力自强的意味。另外,与孙文、章炳麟一起被视为辛亥革命三尊之一的黄兴(1874-1916)在1902年当时还是无名小辈,但是他的字很偶然也是“克强”。而且,小说中架空的新维成功的1912年实际上成为了民国元年。对于这些偶然,似乎连梁启超自己也十分吃惊。

13)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 1902年11月14日(《饮冰室文集点校》2, 758页)。

小说以六十年后的中国为舞台，通过老博士“孔觉民”之口来回想“黄克强”与“李去病”这两人之间围绕中国将来的出路所进行的讨论。“黄克强”是冷静的“改良派”，曾留学德国，受“国家学”启发，以建立立宪君主制为目标；而“李去病”则是“革命派”的热血汉，有着留学法国的经历，信奉卢梭思想。在小说所描写的六十年后的中国，“维新”获得成功，“罗在田”就任大总统，新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这里所说的“维新”，并不是相对于“革命”之义的“改良”，而是不借助暴力来打倒旧政权，通过英明的皇帝的自主退位来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建立共和制。我们从这处的用语上大概也可以窥见梁启超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在两人长达四十几个回合的讨论的最后，梁启超借“黄克强”之口，阐述了折中性的意见来作为“结论”。¹⁴⁾

讲到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作，那里还有第二路不成？今天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¹⁵⁾

针对“黄克强”的这一见解，“李去病”最终也点头赞成。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以实现皇帝下的立宪君主制为目标的“改良派”，虽然有着将共和制的实现视为终极目标的一面，但是最终还是采取阶段论，主张在现阶段引进立宪君主制。虽然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有着革命倾向，言论激进，但是“联合国中志士，训练国中国民”，强调不论是立宪论者还是革命论者，“爱国者同志”应该一致合作致力于“新民”这一课题，做好进入“实行”阶段之前的“准备工作”。¹⁶⁾而且，虽然对于“革命派”为达成立

14) 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的内容分析，请参照王閔梅「梁啓超の『新中国未来記』について——兆民の『三醉人経綸問答』と対照させて」（『言葉と文化』9、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日本語文化専攻、2008年3月）。

15) 《新中国未来及记》《梁启超全集》10，5628页。

16) 几乎在同时期《敬告我国国民（癸卯元旦所感）》（《新民丛报》25，1903年2月11日。《饮冰室文集点校》4所收）中，梁启超也论述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描述了以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72）、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82）、加富尔为中心的意大利统一建国的故事。“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之术者不必同，（中略）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而不相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9、10、14-17、19、22，1902年6月-12月。《饮冰室文集点校》4、2084页），梁启超认为，只要共有爱国这一前提，即便在立宪、共和的手段层面存在着对立，若真把为了救国的变革设定为目标的话，依照各自的主义主张反复进行讨论是理想的状态，立宪论者与革命论者之间也可以成为互补的存在。其理想的“爱国者之间的讨论”的典型就是《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描写的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讨论。另外，在《新民说·论政治能力》中，在论述到积极的互助与消极的互助时，关于立宪和革命，梁启超认为“立宪、革命，本不能为对待之名词。立宪者，虽君统依然，已不得不谓之革命；革命者，虽绝君统，然结局亦不过求立宪。故以对举，实论理学所不许也，今云云者，从普通称谓耳”，“吾见夫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此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各发表其所研究，各预备其所实行，不相菲薄不相师，而岂必为冷嘲热骂为快意，为阴谋倾轧以求胜也？（中略）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政府方以千钧之力相临，而所谓立宪者、革命者，皆如方抽之萌孽，势之强弱，与彼公敌固相万也。庄生不云乎：‘鱼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中略）吾实见夫数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不进，其被压抑于政府者不过十之一，其被摧夷于异党者乃十之九也，是真可为长恻者也。一言蔽之，则亦未明消极的协助之义而已。”（《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新民丛报》49、62，1904年6月28日、1905年2月4日。《饮冰室文

即实现共和制的目标而主张利用暴力的手段这一点并不赞同，但是，也没有明确说要完全放弃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只是应该将其遏制在最小限度内。

在两位主人公讨论的最后，梁启超借“孔觉民”之口阐述了两人理想的交友关系。

他公事上虽争辩到这样，至于讲到私情，还是相亲相爱，从没有因著意见，伤到一点儿交情。近来小学教科书里头，不是都有“黄李联床”一条，讲他们两人的交谊，拿来教那小孩子对待朋友的榜样吗？诸君啊，你们若是要崇拜二杰，便请从这些地方着实崇拜起来，模范起来，我中国前途，也就日进月上的了。¹⁷⁾

也就是说，“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在手段和国家模式的选择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这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存在，不如说他们是一批为了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在“爱国”这一大前提下摸索中国富强之路的忧国志士，同时也是战友。作品中，“黄克强”与“李去病”围绕“改良”和“革命”的是非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持有不同政见却有着亲密的友情，可以说这两人均为一时期的梁启超的分身。¹⁸⁾因为从这一时期的梁启超看来，“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准备工作”的阶段，都是可以超越彼此相异的立场而共同战斗的。当然“黄克强”与“李去病”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然而，正因为是虚构，才将这种只有通过“问答体”才能表现出来的摇摆难定的心理风景更好地刻画出来了。

后来。梁启超对于当时倡导“革命”、“排满”，与师傅康有为意见相左一事，作如下回想：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齏，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相矛盾。¹⁹⁾

集点校》1，648-649页。）

17) 〈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10，5628页。

18) 两位主人公在留学前（最初去英国留学时，黄22岁，李21岁）专心于陆王心学、中国史学、康有为的《长兴学记》、谭嗣同的《仁学》等中国的学问。因为他们认为光靠这些不能救治中国，所以决心在此基础上学习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洋的学问。特别是从黄的角色分担中可以知道其知性人格的形成是梁启超的理想模型。

19) 〈清朝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3100页。这一年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叙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能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中略）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44页。）康有为对这些意见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写了两封长长的信。一封是〈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其抄录以〈南海先生辩革命书〉登载在《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上），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翌年，这两封信作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而刊行。对之，“革命派”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对之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那么，这一时期，康有为所警戒、梁启超所倾斜的“革命”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而且，梁启超又是如何进行“革命”概念的解释，试图将自己的主张正当化的呢？在下一节来进行分析。

二 Revolution与“革命／变革”

据早期的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说，在孙文自觉地使用“革命”一词之前，人们对于反对清朝政府的运动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概念来表达，而其后则发生了变化。²⁰⁾

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又沿用之。²¹⁾

若照此说法，那时“革命”这一概念对于清末的中国人而言是既古老又崭新的东西，未必有着自明的内容。²²⁾梁启超多被归入与“革命派”对立意义上的“改良派”，1903年前后，梁启超分别发表了〈释革〉（1902年）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就“革命”概念进行了解释。²³⁾由于解释概念一事原本就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方向紧密相关，所以，从这两篇文章中对“革命”的解释的变化，也可以读取出梁启超思想的推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02年发表的《释革》一篇。在文章的开头，梁启超这样给“革命”下定义：

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之。）之意也。²⁴⁾

而且，在梁启超看来，在中国，数年前人们呼吁改革，在内忧外患不断深化之中，人们产生了如果不

20) 冯自由《革命逸史》1，中华书局，1981年，1页。

21) 同上，1页。

22) 关于在清末展开的“革命”论的概况，请参照佐藤慎一「二つの「革命史」をめぐって——辛亥革命の歴史意識1・2」(『法学』42-2、43-1、東北大学法学会、1978年9月、1979年5月。该论文未完成)、川尻文彦「清末「革命」考——1900年代初頭の「革命」論を中心に」(『現代中国研究』8、中国現代史研究会、2001年3月)、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3) 〈释革〉《新民丛报》22，1902年12月14日。〈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46·47·48合并号，1904年2月14日（实际上是6月出版的）。

24) 〈释革〉《饮冰室文集点校》4，2242页。

进行Revolution（“变革”）的话就无法救治中国的意识。但是，仿照日本人将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的结果，士大夫们拘于文面，将其误解为必与王朝敌对之物，想要尽可能地避免。另一方面，当权者将其视为对己不利之物而试图进行压制的结果，一国不能顺应世界形势，无法自存。鉴于人们对于“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的“革命”这一用语的恐怖感，梁启超将Reform译为“改革”，而将Revolution译为“变革”。²⁵⁾

梁启超进一步运用其所信奉的进化论的理念来解释“革”，强调中国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渐自毙而不能救者；人事淘汰者，即革之义也。（中略）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²⁶⁾

而且，对于梁启超而言，“淘汰”就是“变革”，其不仅限于政治上，而且必须适用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他认为，日本人称为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产业革命，而在今日中国则是“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这些名词并不是与朝廷或政府对立的概念，并不足恐惧。²⁷⁾“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不存在“国民的变革”的易姓就不能称为Revolution。²⁸⁾在这里梁启超将像法国大革命

25) 同上，2242页。

26) 同上，2242-2243页。革命派邹容在《革命军》的〈绪论〉中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中略）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掘，过昨天，历今天，皆革命之现象也。（中略）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651-652页。）从邹容的这些言论来看，鼓吹“破坏”时期的梁启超，其主张的实质内容几与“革命派”相近，革命论与急进的改革论的分界线并不那么鲜明。

27) 例如，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谈到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玛赛郎（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 -1521）然后可。（中略）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中略）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夏威夷游记〉《饮冰室文集点校》3，1826-1827页。）而且，在〈新民说·论进步〉中，在谈到“破坏”时，“此犹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文集点校》1，585页）。

28) 〈释革〉《饮冰室文集点校》4，2243页。“革命派”章炳麟在为邹容的《革命军》撰写的〈序〉中，这样写道：“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胡，所当谋

命那样的“近代的革命”与像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那样的“传统的革命”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前者是“以仁易暴”，后者是“以暴易暴”。²⁹⁾ 换言之，这不仅扭转了人们以往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印象，而且与此前的“传统的革命”划清界限，对于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在中国出现的变革寄予了极大的期待。³⁰⁾ 另一方面，Revolution也未必须易姓。除了法国，在其他欧洲各国王统依然存在，在梁启超看来，世界上真正配得上Revolution之名的变革并不太多。除了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外，让皇统持续且完成明治维新的尊王攘夷、废藩置县也是“革命事业”。论说的最后，梁启超这样收尾：

吾故曰：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呜呼！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呜呼！³¹⁾

总之，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梁启超的心情，在1902年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发表以及在〈释革〉一文中对“变革”这一译词的选择上。他强调在社会的所有领域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性，试图将这些称为“革命”，但是为了警戒“革命”二字给人们带来的强烈的印象冲击，他于是在文化方面的变革上使用“革命”，而在政治方面则以“变革”一词来代替。

然而，在1903年革命势力抬头之际，从美国游历归来的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

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50页。）也就是说，章炳麟自身将“革命”限定为“光复”，主张目前应该以“排满”为主，而将邹容所说的“革命”认为包含有“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等很宽泛的内容。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了〈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认为“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同上，68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邹容所称的“革命”与梁启超的非常相近。

29) 在“黄克强”与“李去病”的第五回论战中，主张革命的“李去病”认为以往的中国的王朝更替是“以暴易暴”、法国大革命等近代革命是“以仁易暴”，对两者区别对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10，5619页）。

30) 关于近代中国的法国大革命论的系谱与变迁，请参照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二章 フランス革命と中国」。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梁启超将“破坏”分为“无血之破坏”与“有血之破坏”，日本和法国分别为其代表。他处于一种矛盾与纠葛的情结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引用中看出。“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哀絰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中略）吾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历史，见夫杀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吾未尝不股慄。虽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国中如无破坏之种子，则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略）吾亦欲曰：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以破坏乎！（中略）虽然，破坏亦岂易言哉？玛志尼曰：‘破坏也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使为破坏而破坏者，则何取乎破坏，且亦将并破坏之业而不能就也。’吾请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文集点校》1，587-589页。）

31) 〈释革〉《饮冰室文集点校》4，2244页。

究)一文,一改其此前的主张。该文的主题是在讨论历史上的事例的基础上强调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危险性。这很显然是站在与“革命派”相区别的“改良派”的立场上来书写的,展开了与“革命派”对立见解的中国革命史,引起了“革命派”陈天华的直接反击。³²⁾

他首先从三个层面上来阐释“革命”的意思。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和平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³³⁾

按照这种分类来看中国以往的革命的话,那么在中国只存在所谓的狭义的革命,而且梁启超认为,现时论述中国革命也只是这种狭义的革命,以打倒满洲王朝作为革命的最大的使命。然而,在过去反复出现的中国的革命,其结果并不益于社会的进步改造,与之相对,虽然欧洲各国的革命失败之例很多,但是对于社会进化的贡献很大。其原因存于何处呢?梁启超紧接着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进行了比较,将其特色概括为以下七点。即,一、在中国,有私人革命,却没有团体革命;二、在中国,有野心的革命,却没有自卫的革命;三、在中国,有上等社会、下等社会的革命,却没有中等社会的革命;四、泰西是单纯的革命,而中国是复杂的革命;五、在革命时间上,泰西短,而中国长;六、在中国,革命家之间的内讧多;七、在中国,革命时代容易招致外族的侵入。³⁴⁾这样梁启超得出的结论就是“革命”不适合现阶段的中国。

那么,在清末,救治中国的方法到底是依靠以往反复的革命,还是不依靠革命也能救治中国呢?对于这个问题,梁启超认为“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此七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门也”,若没有这七大特色能够完成革命的话,则革命就是现在救治中国的唯一出路。³⁵⁾但是,虽然在目前的中国,革命志士所怀抱的理想与这七大特色并不相容,而事实上没有这不好的特色则很难进行革命,所以,从现状上看,救治中国的方法,不应该是革命,备于有事、充实国力才是当务之急。这里体现出了梁启超的革命观,即否定暴力革命,将欧洲各发达国家的革命视为理想的革命形态,在向其渐进的接近过程中寻求救治中国之路。

而且,1913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后的“第二革命”,这一年梁启超发表了〈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继承了警戒革命的论调。³⁶⁾在他看来,革命已经经历过一次的话,就会持续两次、三次,“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³⁷⁾梁启超举出历史上的很多事例,断言

32)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1、2,1905年10月20日、1906年5月6日(陈天华著,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饶怀民补订,补订版,2008年所收)。在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76,1906年3月9日)中,谈到了〈中国革命史论〉中陈天华的论点。

33)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饮冰室文集点校》3,1671页。

34) 同上,1671-1675页。

35) 同上,1675-1676页。

36)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1-14,1913年6月16日。

37)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饮冰室文集点校》4,2379页。

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革命只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³⁸⁾

从〈释革〉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虽然其间只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在对“革命”的解释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当然，可以联想到包括师傅康有为所写的两封劝告信以及围绕“革命”与“自立”的师徒讨论等在内的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夹在其中的1903年的美国游历才是梁启超对于革命以及共和政治的看法上出现转变的决定性契机。

三 1903年的美国游历——思想转变的一契机

1903年1月，梁启超开始了前往美国的旅程。³⁹⁾关于他此次美国之行的动机和目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其中，受康有为派遣去调查在外华侨的生活实态、巩固保皇会（中国维新会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基盘一说则十分有力。加之，梁启超自身也有亲眼一睹美国社会以及风俗的愿望。实际上，1899年，梁启超已经试图经由夏威夷前往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现。⁴⁰⁾尽管如此，从“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⁴¹⁾一句看来，不难想象出他对新大陆美国充满憧憬与期待的样子。当然，这次的美国之行也绝非停留于一般的观光。为了摸索中国的未来之路而前往考察的目的地是美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是美国，但是，梁启超从内心深处所关怀的则是中国。1898年逃亡日本后，梁启超的思想逐渐偏离以往的立场，开始倡导“革命”、“排满”、“破坏”，不断趋于激进，其顶点就是去美国之前的1902年，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而另一方面，以〈新民说〉的论述重点从“公德”转向“私德”这一论调上的变化等为依据，视1903年的美国游历为一分水岭，并以此为界，认为梁启超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也已有研究指摘。⁴²⁾那么，梁启超在美国究竟看到了

38) 同上，2382页。

39) 关于梁启超的美国游历的具体分析，请参照川尻文彦「梁啓超と「アメリカ」——1904年の「新大陸遊記」をめぐる」(『中国研究集刊』37、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05年6月)。

40) 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的开头，梁启超这样记下了1899年未能实现美国之行的理由。“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旧金山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涂，前所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所谓“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者是也。道出夏威夷岛。（即檀香山。）夏人繁维之，约留一月行。既而防疫事起，全市华侨廛宅付一炬，环岛不通行旅者数阅月，于是余自庚子正月至五月，蛰居夏威夷。六月十七严装往美，忽得上海电，促之归。遂以二十日回马首而西，道日本返上海，遽闻汉口之变，志不遂，遂折而南，由香港而星加坡而檳榔屿而印度，绕澳大利亚一周。辛丑四月，经菲律宾复至日本，居日本者又几两年。至是始续旧游，实癸卯正月廿三日也。”(〈新大陆游记节录〉《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年2月。《饮冰室文集点校》3，1834页。)

41) 〈二十一世纪太平洋歌〉1899年(《饮冰室文集点校》6，3734页)。

42) 请参照狭間直樹「『新民說』略論」(同編『共同研究 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第六章〈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之言行〉。对此，高柳信夫以内在于梁启超的文本的论理为中心进行分析，认为梁启超1903年的所谓“转向”几乎未给他思想的内部构造带来变动，从而强调其前后的连续性。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这种连续性只不过是梁启超的文本内部而已，若要更为广阔的文脉中来评价的话，1903年前后梁启超所起的作用有着很大的质的差异，这一说法似乎更为有力(高柳信夫「梁啓超の所謂「轉身」について——『新民說』「論私徳」とその周辺」『東洋文化研究』4、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2002年、26页)。总之，以美国游历为界，梁启超在思想上存在着某种转变，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没有异议的。

些什么？他有何感想？同时又是如何预测中国的前途的呢？

梁启超主要关心的是去亲眼观察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及华人社会。

首先，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虽然是观念性的，梁启超早就开始加以关注了，并对之十分憧憬。正如〈自由祖国之祖〉一题所示，梁启超讲述了始于普利茅斯的美国建国神话，说“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将美国定位为自由之国的开山之祖。⁴³⁾在抵达波士顿时，梁启超颇有感慨地说：“波士顿者，美国历史上最有关系之地，而共和政治之发光点也”，“吾梦想此境者有年，吾今乃得亲履其地，抚其遗迹，余欣慰可知矣”。⁴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人合众自立之端绪，殆无一不发源于波士顿”，可以说波士顿是“美国合众自立之母”。⁴⁵⁾而且，他特别选取1774年波士顿倾茶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进行对照比较，认为“斯事与林文忠〔林则徐〕在广东焚毁英人鸦片绝相类，而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则岂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国民实力强弱悬绝之为之也？”⁴⁶⁾

就是这样一个对美国抱有如此梦想的梁启超，在见到美国的实际情况之后，对其民主政治，开始逐渐抱有复杂的感情了。例如，他指出，“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莫如纽约”⁴⁷⁾，“南部诸省号称共和政体，实则至今仍寡头政体也”⁴⁸⁾。美国也存在着财产分配的不公平、严重的贫富分化、巨额的选举费用、党派相争的激化、市政的混乱、职权的乱用、公益的蹂躏等等，因而现实中的美国绝非想象中那个带有玫瑰色彩的美国。⁴⁹⁾

其次，对于梁启超而言，这次的游历在视察美国的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一次审视。因为美国的华人社会的现状是预测中国未来走向的试纸。

视察了华人的八大会馆和中华会馆的梁启超，将这两者的关系比拟为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美国先有各州，然后成立了联邦，与之类似，先有了各会馆，然后才有中华会馆。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还有三十多个州加入，同样，中华会馆成立后，还有两个会馆加入。在美国联邦政府刚成立时，其财政未能独立，各州进行供给，而八大会馆对于中华会馆也是这种关系。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眼里，中华会馆的地位，与从独立到立宪十年间（1776-87年）的美国酷似。⁵⁰⁾而且，他观察了华人的素质，举出其长处在于“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主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等。⁵¹⁾

然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对照着在美国的见闻，更为详尽地论述了中国人的缺点和短处。“一曰有族

43) 〈自由书·自由祖国之祖〉《清议报》26, 1899年9月5日（《饮冰室文集点校》4, 2252页）。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有关5月中旬停留在波士顿时段落里，几乎全文引用了〈自由书·自由祖国之祖〉。

44)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 1861页。

45) 同上, 1862页。

46) 同上, 1862页。

47) 同上, 1855页。

48) 同上, 1884页。

49) 在分析美国的政治时，梁启超参照人见一太郎（1865-1924）翻译的日语版《平民政治》（民友社，1889-91年），引用了James Bryce（1838-1922）的观点。

50)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 1903-1907页。

51) 同上, 1900页。

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⁵²⁾ 在中国，作为建国基础的自治决不脆弱，但是之所以不能组织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在中国只有“族制的自治”的发达。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去美国之后越发确信。⁵³⁾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⁵⁴⁾ 他一方面承认原本美国的民主政治就是各州各市的爱国心、爱市中心，也就是从村落思想发展而来的，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却因为过于发达而成为建国的一大阻碍。⁵⁵⁾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总统在演说中认为对于美国而言摆脱村落思想是一大课题，这也是因为美国建国之源的村落思想现在仍未彻底去除，现在的工作实际上是美国鼓励推行“帝国主义”，呈现出日渐趋于中央集权的征兆。⁵⁶⁾ 在梁启超看来，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美国政治的特色在于双重的政府，人民也有双重的爱国心，其得以实现共和政体是因为“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⁵⁷⁾。所以，不认清大楼（联邦政府）与小楼（各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了解美国发展至今的轨迹。其他国家都是通过国民这一元素而被组织起来的，但是，由于美国是由国民以及由国民组成的小国家这两个元素组成的，所以，在美国国会的两议院中，下议院代表国民，而上议院则代表由国民组成的小国家。⁵⁸⁾ 在结束了在美视察之际，梁启超得出以下结论。

法儒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言：欲行民主之制，非众小邦相联结不可。德儒波伦哈克（Konrad Bornhak, 1861-1944）亦言：共和政体之要素有数端，而其最要者曰国境甚狭。吾观于美国，而知其信然矣。彼美国者，非徒四十四个小共和国而已，而此各小共和国之中，又有其更小焉者存。（中略）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⁵⁹⁾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⁶⁰⁾ “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⁶¹⁾，梁启超在看到了旧金山的华人社会后这一感觉更为强烈。海外的中华会馆要么是上等社会的有权有势者专断、众人唯唯诺诺的“寡人专制”，要么是在上流社会没有有权有势者时无赖之徒专断的“暴民专制”，两者必居其

52) 同上，1908页。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说“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文集点校》1，550页），“人群之初结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文集点校》1，556页）。

53)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1908页。在回国后写的论说中，梁启超说“盖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未尝有也”，强调了能够担任民主政治的有“政治能力”的“市民”的存在（《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文集点校》1，644页）。

54)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1908页。

55) 同上，1908页。

56) 同上，1914页。

57) 同上，1914-1915页。

58) 同上，1915页。

59) 同上，1915页。

60) 同上，1908页。

61) 同上，1908页。

一。梁启超认为，像这样的国民的话，不能进行合议制度与选举制度。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⁶²⁾

也就是说，在视察了华人社会的自治组织后，梁启超觉得，若给华人进一步的自由的话，就有可能陷入“暴民政治”的危险，所以他确信，根据国民的程度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自由和民主政治是行不通的。这一认识后来发展成“开明专制论”，即以权力层进行改造与革新来取代从底层塑造“新民”的方针。⁶³⁾

梁启超认为以上三点都是没有政治能力、保守心强的表现，更进一步，“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才是中国人的根本缺点。⁶⁴⁾ 因为他认为西洋的精神文明的发达是以“好美心”、“社会之名誉心”、“宗教之未来观念”这三点为根本的，而在中国这些是最为欠缺的。⁶⁵⁾ 这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反复论及的主题，对他而言也无疑是“新民”的课题。

最后，归途上梁启超抒发的感慨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高评价以及对于“革命”的拒绝。在他看来，确实美国脱离英国获得了自由，但是美国之所以能获得自由不是因为从英国获得了独立，而是因为本身就是自由的。自由不是突然之间产生之物。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确实是为了寻求自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为“暴民专制”，进而又变为“帝国专制”，经过八十多年之后仍未获得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另外，南美各国更是反面教材。大家进行革命寻求自由，但是结果六七十年来，始终是暴动连续的“蛮酋专制”，寻求像美国那样的自由更是无望。梁启超坚定地认为美国获得自由的原因必定在“革命”之外。⁶⁶⁾

在美国期间，梁启超就共和政治的起源、发展、现状等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观察，发现若无自治的传统、经济与文化的发达这些前提的话，共和制的确立将很困难。结束了美国之行的梁启超，深感政党制的弊害以及政治家的贪欲等民主政治的界限，认识到美国并非如想象般那样是民主政治完备的理想国。然

62) 同上，1919页。

63)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73-75、77，1906年1月-3月。具体分析，请参照高柳信夫「梁啓超「開明專制論」をめぐって」(『言語・文化・社会』1、学習院大学外国語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3月)。所谓“开明专制”是指根据当时中国的状况，基于民众的政治能力尚未达到实行西欧式民主共和制的程度，主张先将中国的统治权委托给优秀且开明的个人或集团，让他们来实行专制的统治，在这期间对人民实施政治教育与训练，期待依靠政府的启蒙以逐渐转到以议会制度为主的民主政治体制。1906-07年，梁启超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是“革命”还是“开明专制”的激烈论战。

64)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文集点校》3，1908-1909页。

65) 同上，1910页。

66) 同上，1915页。

而，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以上所论，言美国民主政治之缺点居多。虽然，以赫赫之美国，岂其于政治上无特别善良之处，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⁶⁷⁾由此可见，其批判均仅限于与政治的运用、体制的运营相关的细节，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本身的评价依然很高。梁启超从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基础里看到了高度的“民智”，在华人社会里找到了中国人社会的缩影，深切地感受到共和制本身虽然是不错的制度，但是在实际推行中所显现出的人力之差正是美国与中国之差。这次游历后，梁启超以让民主政发挥机能的美国为镜，审视中国的现状，继续摸索中国的未来之路，不断地进行着自身思想的建构。

结 语

以上，笔者首先在介绍了梁启超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着眼于1902年前后的时代背景，以梁启超所撰写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切入点，对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改良”抑或“革命”的心理纠结进行分析。其次，按时间顺序考察梁启超关于“革命”的一系列言论，从对Revolution的译词选择、对“革命”概念的解释等方面来探究他思想的变化。最后，对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游历时的见闻录进行分析，寻找出促使其思想发生转变的契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这一原本来自《易经》、专指政治上的急剧变革的词语，在明治日本则作为Revolution的译词来泛指包括以和平方式促使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变化在内的一切变革，而梁启超在向中国介绍时则由于向往明治维新的改革模式，为了使人们暂时摆脱对“革命”传统含义的心理压力而翻译成“变革”来加以区别，为政治理想提供了新的想象。随着自身见闻以及时代状况的变化，梁启超对于“革命”的解释以及态度虽然前后不尽一致，但是其试图寻求变革、摸索中国的未来之路的想法却是一以贯之而丝毫未变的。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再回到那个年代来重新探讨一下当时众口相传的“革命”的含义，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7) 同上，1921页。

